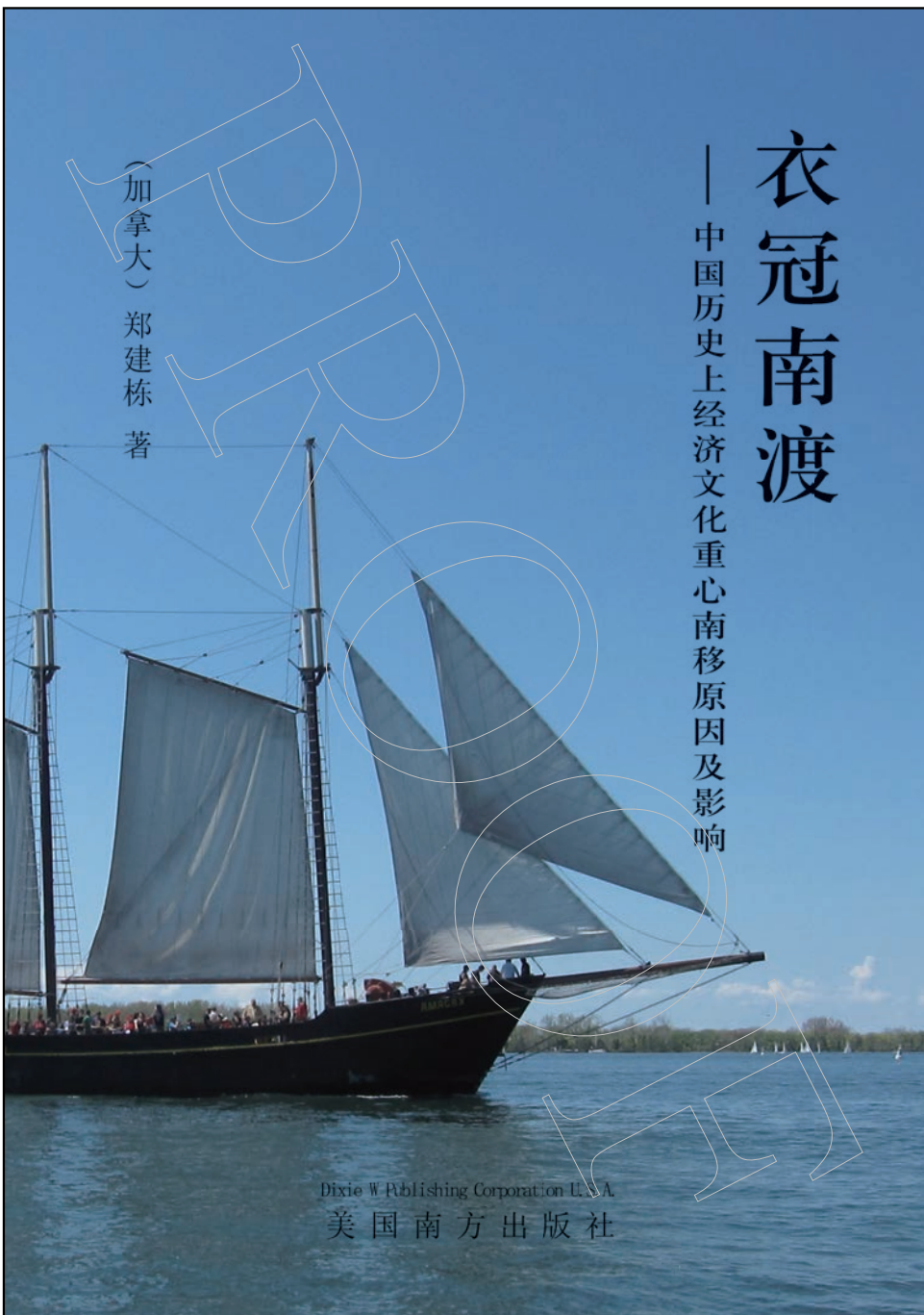




衣冠南渡：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原因及影响 / 郑建栋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张 蕾

封面摄影：郑建栋

封面设计：郑建栋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Northern Gentries: The Reasons and Impacts
of the Southward Shift of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re in Chinese History
© 2025 by Jiandong Zhe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5 年 9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360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5944484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5944484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757-6

作者简介

郑建栋：笔名“北隐”，生于上海，1969 年下乡至黑龙江农场，1977 年考入上海科学技术大学，1986 年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任中学文科教师、政府官员、研究所工程师、香港公司部门经理、美国公司资深工程师。已退休，居于加拿大。现为“加拿大海外作家协会”和“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会员。译有亨利·詹姆斯的中短篇小说集《大师的教诲》以及玛丽·雪莱的长篇小说《洛多尔夫人》。

目录

自序	1
----	---

概述

一. 本书要旨	4
二. 中国经济、文化时期划分	9
三. 研究衣冠南渡的意义	26
四. 民族性话题及民族性研究的意义	35

第一章 永嘉之祸

一.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中国政治格局	40
二. 西晋的政治气候和永嘉之祸	45
三. 永嘉南渡	55
四. 混乱、苦痛，但极具精神的时代	62

第二章 安史之乱

一. 初唐及中唐时期的政治和经济	97
二. 安史之乱及天可汗制度的兴衰	101
三. 安史之乱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111
四. 繁荣的经济、先进的科技和灿烂的文化	123
五. 安史之乱前后文化状况之比较	134

第三章 靖康之变

- 一. 北宋末年的政治气候与靖康之变..... 146
- 二. 建炎南渡..... 156
- 三. 词作风格的演变与爱国主题..... 164
- 四. 经济变革、艺术继承与文化融合..... 174

第四章 崇祯大乱

- 一. 明初大移民及解流民之患..... 195
- 二. 明朝末年的政治气候..... 207
- 三. 应对失据的经济困境..... 217
- 四. 崇祯大乱及南明的苟延残喘..... 225
- 五. 明朝遗（移）民..... 236
- 六. 平民文化、西学中用与学风东渐..... 244

第五章 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原因

- 一. 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 256
- 二. 中原政权的腐朽和权位之争..... 283
- 三. 家天下的困局..... 298
- 四. 北方赋役之苦..... 316
- 五. 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原因之分析..... 323

第六章 民族性及一些史学观点的探讨

- 一. 民族性的讨论..... 352
- 二. 儒家思想之于民族性格塑造..... 391
- 三. 华夷之辨和尊王攘夷之异化..... 426
- 四. 国家概念和传统民族史观的探讨..... 439

- 参考、引用文献..... 448

自序

写就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一直是我的尝试、也是我的夙愿。早在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时就怀揣著成为历史学家的理想，把我对某个历史事件的看法写成书籍。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我走上了学习理工科的道路，与史学失之交臂。毕业后的工作忙碌使我顾不上仔细考虑我的写作计划。好在从事科技工作之余，我都有充足的时间浏览群书，从历史书籍中得到自己的知识养料。写“衣冠南渡”这个课题的念头大约萌生于十多年前：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中国人远离祖国、定居他乡？本想写有关海外华人事业的有关主题。但这个主题太过宽泛，缺少历史沉淀和知识含量，于是我把主题收窄为古代中华民族的移民史，进而收窄为北亚民族南侵引起或促成中原汉民族南迁以及政权更替的主题。国内学者对这一主题已有不少精辟且深入的研究，但大多涉及面偏窄、就事论事，缺少广度和高度。但对于我来说，这些珍贵的资料作为非常好的学习范本去阅读，不失为一次再学习的过程。

要写“衣冠南渡”不能不涉及民族及民族性话题，在中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也仍然是诉诸民族主义。既被外族入侵而又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是中国人很难迈过的感情门槛，更何况造成衣冠南渡的入侵外寇竟然是北方的匈奴、契丹、女真等蕞尔小族。中国人向来有大国情结，尤其是历朝汉王朝统治者，总是把中原看成是文明（civilization）的故土。中原人原来称呼其以东的部落的“夷”，逐步赋予了贬义色彩，如周边一切其他族裔被统称为蛮族（barbarians）：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自秦汉以后，中原各国对北方异族无差别地统称为“狄”，进而用“夷”来代指东方海

外朝鲜、日本等非汉族群。到明清之际，来华的欧美人也被列入“夷”的范围。近来有学者把上古中原人用于区别华夏与四方夷族概念的“华夷之辨”译成了英语“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文明与野蛮之区别”、“文野之别”）。这样，原本用以划分中原和周边部落的一根地理界线变成了横亘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一条鸿沟；中国人便在这鸿沟的两边跳跃：要么奴颜婢膝、要么“中国可以说不”。这种变态民族主义的“受害人心理发作，不仅不能实现公正，反而会在毁灭自己的所恨的同时，毁灭无辜和自己的所爱，陪葬的还有你本想实现的正义。”¹因此，不再让仇恨和复仇主宰自己，用平视的角度去拨开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面纱，究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史学界的责任。研究衣冠南渡与研究中国历史一起，探究其中奥秘，给未来一个清晰的认识。

上个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后曾出现过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以“疑古辨伪”为论题展开史学疑古和考信研究。史学界也有个广为人知的口号——“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语出自曾任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而傅深受“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极为提倡史学的“客观性”。但史料何以为真？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不乏对“五帝”²传说的记载；而五帝史已被后世史学界证明为口传历史，有待考证。但对史料过度的存疑又不免遁入怀疑论的迷雾、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

中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然则“历史是每一个史家根据现时生活兴趣，对过去史实加以批判和整理，所产生的一件作品；与生活不生关联，思想的光辉所照耀不到的全是一些空洞的叙述和死证据。”因此，我们“必须采某一个立点，取某一个角度，把光投到某一个焦点上，”³必须

1 见吴稼祥《“中国不高兴”推销病态民族主义》。

2 最早记有“三皇五帝”的是《吕氏春秋》。《史记》中只提及“三皇”：“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见《秦始皇本纪》），而无详细记载。后由唐代司马贞补作《三皇本纪》。虽然补了《史记》之阙，但不被奉为正史。《史记》记载“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ㄊㄨˋ，kù）、尧、舜。

3 均见朱光潜先生《克罗齐哲学述评 第六章 历史学》。朱光潜（1897-1986），现代中国著名美学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

从这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选择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某个主题作一充实的、有理有据的叙述，将历史对现实作出投射，使现时的人们从历史事件中作出比较、得到借鉴。历史不能只是简单的叙述，历史必须是批判的；我们必须按下自己的爱恨情仇，化情感的宣泄为有价值的思想。“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必须是以自由之思想，为了正义、为了理想而在学术的自由世界里放飞自己。“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⁴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我这一路走来，不仅有搜集史料的艰辛，也有去伪存真、沙里淘金的兴奋。现在我就把这些许闪亮的金子献给我的读者。

本书所引用的均为学术价值很高的史料、论著和论文，记事翔实、论证有力，以尽全力来客观地还原历史。在叙述南渡史、探讨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原因及影响，以及民族性等主题上，作者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言。本书可供史学爱好者增长知识、拓宽视野，也可供立志从事史学研究的大学历史系学生作为了解南渡史的参考资料。

4 均见《孟子〈公孙丑上〉》。“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耷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白话：曾子对子襄说：“您喜欢勇敢吗？我曾经听到孔子说过关于大勇的道理：反省自己而觉得理亏时，那么即便面对贫贱百姓，我也不去恐吓他们；反省自己而觉得理直时，纵然面对千军万马的敌人，我也勇往直前去战胜它。”褐：毛布；宽博：宽大之衣；褐宽博：贱者之服也；缩（ㄇˊ，sù）：直也；耷：恐惧之也；往：往而致之也。（词语解释据朱熹《孟子集注》）

一．本书要旨

“衣冠”：指古代士族峨冠博带、风度翩翩、衣冠楚楚；“南渡”：南渡过长江；“衣冠南渡”：即指由于某些原因，北方士族及其眷属南渡到江南。据考，“衣冠南渡”一词首次出现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著之《史通》：

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一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澠可分，得乎？其于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⁵

该文中的“衣冠南渡”原仅指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峨冠博带的名门士族大户、官宦士绅为避祸乱而南迁。后“衣冠南渡”逐渐演化为熟典，代指北方百姓避乱于南方并在那里落地生根的事件。

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数次暴力进入中原建立政权，或由于中原政权的内乱，迫使汉族王室成员、士大夫阶层，也包括农民阶层等，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数次大规模南迁。就一般历史记载，都称三次衣冠南渡，包括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后的安史南渡，以及北

5 见（唐）刘知几《史通 卷五 邑里第十九》。

宋末年的建炎南渡。随着满清入关和朱明王朝的崩塌，大量汉人选择流亡海外，以及1949年大陆易帜前后大量政府官员、文人、有资产人士和军人前往台湾。有历史学者将明末崇祯年间这段移民史、国共内战时的民国政府迁台，甚至中共建政初期的逃港潮也纳入南渡范畴。本书稿则有所取舍，将崇祯南渡纳入南渡范畴，并对史学界不够重视的这次南渡作一定力度的叙述。

张家驹先生⁶在《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中写道：

民族国家之发展，文化随而扩充；混合同化之结果，社会中心亦因以转移。盖每一次迁徙或扩张，势必促成新旧民族之接触。结果必使在文化上一面受原有居民之影响；一面则胜者及其文化，终为土著所吸收，其行甚缓，厥功甚伟。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大规模人口迁徙是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资源短缺、气候变迁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尽管在中国传统中，“安土重迁”⁷一直是埋藏于人们心底的文化基因，尤其是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世代代以土地作为生命的维系。但是数千年来，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仍不时发生。从“江西填湖广”到“湖广填四川”，从晋朝“永嘉南渡”到明末“下南洋”，发生在广阔时空的人口流动，加速了地域文化的融合汇通和中华文明对亚洲文化的辐射作用，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儒家文化圈。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⁸南京秦淮河畔的乌衣巷，狭窄幽静、历史悠久，如今是游客必去的怀古凭吊之地。唐代诗人刘禹锡所说的“旧时王谢”，指的是晋朝王、谢两个豪门大族。这两大家族不仅出了王导、谢安等名臣能相，更有王羲之、谢灵运等文化巨擘，他们便是西晋末年永嘉南渡的移民。

结束了汉末天下纷乱、三国鼎立局面的西晋，好景不长，先有“八王

6 张家驹（1914—1974）：中国历史学家，专攻宋史研究。

7 安土重（ zhòng ）迁：安于本乡本土，不愿轻易迁徙。

8 见（唐）刘禹锡《乌衣巷》。

之乱”、后有“五胡乱华”，加之灾荒频发、寇贼并起。永嘉五年（311），都城洛阳沦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王公士民被杀者三万余，宫内珍宝财物和宫女被掠无数，宫庙官府和民房被烧，十分惨烈，史称“永嘉之祸”。永嘉之祸使北方的官民十分恐慌，中原士族大批南渡，百姓庶民也跟着逃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衣冠南渡”之潮。大批北方流民沿着大运河、⁹汉水南下，涌入江淮、两湖之地，其中以今日江苏各地为多。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南渡士族与江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建立新王朝，史称“东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代诗人杜牧在《过华清宫》中讽刺了唐玄宗、杨贵妃的腐朽糜烂的生活。国史一般认为唐廷这种腐朽糜烂的生活、重用权相李林甫和国舅杨国忠是造成“安史之乱”的主要诱因。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转折。此前，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偏重于北方黄河流域；此后，经济文化的重心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南转移。安禄山，父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母为突厥巫师。安禄山是唐代藩镇割据势力之一的最初建立者，也是安史之乱的主要发动人之一，安史之乱后建立了燕政权，年号“圣武”。史思明为突厥或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因此，安史之乱有时也被认为是北亚外族引起的动乱。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原士民为避战祸，纷纷举家南迁。“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¹⁰李白这样描绘：“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¹¹可见，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又是一次对长江流域的大规模移民潮流。这次的移民潮，移入地不仅有江淮、江汉，还有川蜀之地。唐玄宗避祸入蜀，也引得大批北方士民迁蜀。四川是天府之国，历史上一直是富庶之地、相对安稳，许多北人入川之后，就定居下来。虽然唐王朝的政治重心并没有因“安史之乱”而转移，长安城依然是都城，但这一次的南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凋敝和南

⁹ 筑于隋唐之前的大运河，后世称为“邗沟”，是大运河中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一段河道。

¹⁰ 见（唐）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¹¹ 见（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 其二》。

方的勃兴，为江南发展奠定了经济和人文基础。

“靖康之变”则造成了第三次大规模的中原汉族南渡。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破宋都汴京（今开封），次年二月掳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王朝覆亡。后赵构称帝（宋高宗），建立南宋政权，随着金兵南下，被迫南迁，最终定都临安（今杭州）。正如朱熹所述：“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¹²随着宋室南迁浙江，备受战争之苦的北方百姓也纷纷南下，“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¹³百姓移民规模更为庞大，移民的区域也更为广阔。长江流域自西至东，几乎都是移民的迁入地，甚至福建、广东等地也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¹⁴赵宋政治中心和北方移民的南迁、四方士民商贾辐辏，意味着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基本完成。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对长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长江文化再次感染上浓厚的黄河文化色彩，并完全确立了此后长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江西也是宋代文化重镇、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地之一。由于未能收复中原，偏安于江南的南宋政权被迫限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与金国处于长期军事对峙状态。但这150年的无战事也刺激了南宋手工业、造船业、航运贸易等经济及科技的发展。最早出现于五代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在南宋开创出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新局面。

明朝曾发生两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明初大移民和明末移（遗）民。明初大移民包括洪武大移民和“靖难之役”后的永乐移民。

洪武帝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官方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人口移民，这是一次统治者主观上的、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的主动大迁徙，主要发生在今天江苏和安徽两地。建朝之初，朱元璋面对这种满目疮痍、田荒地荒的局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山西、江西等地由于战事相对较少，

¹² 见（宋）朱熹《跋吕仁甫诸公帖》。

¹³ （元）脱脱《宋史 志第一百三十一 食货上六》：“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既为之衣食以振其饥寒，又为之医药以救其疾病；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瘞埋之。”

¹⁴ 见（宋）庄绰《鸡肋编 卷上》。

人口较多，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山西洪洞大槐树和江西鄱阳瓦屑坝，成为这次“洪武大移民”主要集散地。江西饶州等地的移民，以瓦屑坝为中转站，背井离乡，迁往鄂、皖、湘等省。

经过元末军阀战争，江淮地区人烟稀少。扬州城破时，“居民仅余十八家”，而淮安城仅存七家。而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且曾支持过朱元璋的劲敌张士诚。因此朱元璋对张士诚曾作隆平府的苏州以及松江、嘉兴等地的居民进行报复、也防止张士诚原有臣民不服统治，便采取移民措施，将其数十万人口迁移至淮安、扬州、盐城、泰州、凤阳，客观上使得淮、扬等地人口得到了补充、经济上得到恢复。洪武末，朱元璋又迁江南民 14 万户于明朝中都凤阳。

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用了 3 年时间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篡夺得皇位。这 3 年时间从燕京进军到攻下帝都应天府（今南京），除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反复的拉锯战又使得淮河以北的经济遭到破坏。朱棣登基后，减免了河北、河南、山东等曾为战场的省份的赋税，以休养生息。同时明廷又由山西迁出一大批民众到华北平原。永乐移民的特点是：首都迁居北京后，朱棣又将南京官民移居北京；为同时兼顾南北两地的经济恢复，还实行南北两京（复都）制度。总体来说，永乐移民是为政治服务，尤以新建的国都为重中之重。

而第二次人口大迁徙则是被动的，是由政治动乱和自然环境恶变所引起，是明朝覆没前后的一次民族大逃难。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崇祯六年（1633），波及华北数省的“明末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崇祯十四年（1641）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年），李自成的 50 万大顺农民军入京。大顺军破城前，京师瘟疫大作，死亡 20 多万人。李自成、明朝、满清军队互相交战，京城百姓多有伤亡。明将吴三桂降于清军并在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战役”中，联合清军击溃李自成并引清兵入关。天灾人祸，此时明朝抵挡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甲申之变”后，明朝士大夫身份被迫发生了转换，成为大明遗民。满清靠武力占领了汉地并对汉民进行

大肆杀戮；又基于明、清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大明遗民和清朝的矛盾非常尖锐。于是大量北方士民不只选择遁入南方深山大泽，更有大量不事清朝的大明官员和庶民选择徙往海外。

中原文明数度南移，带动了华夏文明的南播，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国文化的空间分布、风格和流派的产生都有重大影响。中原南渡移民在南方蔓枝展叶、开花结果，且未发生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大的战争，实现了南北文明的同构与融合。吕思勉先生于《两晋南北朝史》一书中，在论及中原士庶南渡后的两晋、南北朝风俗之变迁时，也感叹道：“斯时代之大事，尤莫如南北意见之渐见融和。”¹⁵ 这种南北文化和生活之“融和”是与中华民族极具包容性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对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经济、文化时期划分

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文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重要的时期：第一阶段为远古至西晋末年，其中以三国、孙吴时转变较大；第二阶段为东晋至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乱划分为前后；第三阶段为南宋建立至鸦片战争，由北至南的经济重心逐步转移的趋势，已使此时长江以南经济已完全超越黄河中下游。张家驹在《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一书中根据中国社会中心转移提出了历史分期的核心观点：

其渐进之次第，始而及诸江淮，继而浙闽百粤。约分析之，以为三期：（一）. 自上古以迄西晋，北方实为根本，衣冠人物之所萃；南方鄙野，形势悬殊，三千年来，可称为北方中心时代。（二）. 及至五胡大入，中枢南移，以至北宋之末，经营垂八百年，筚路蓝缕，始克相顾，是可为文化统一时代。（三）. 降及近世，

15 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会组织。吕思勉（1884—1957），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中国四大史学家”。